反叛与规训：解读 E.M. 福斯特《莫瑞斯》中的同性恋再现

陈静梅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福斯特的《莫瑞斯》对男同性恋的再现是理解其反叛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以同性恋欲望作为重塑中产阶级男性的突破口，在打破异性恋与同性恋对立的同时仍无力甩脱传统的性别头盔。虽然积极开放出多元化的男同性恋情，却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赋予男同性恋情以合理性与未来。总之，它体现了在对意识形态的反叛与规训之间暧昧交织的复杂面貌。

关键词：福斯特；《莫瑞斯》；同性恋；反叛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7)03-0339-04

有关上世纪英国文坛的重要作家 E.M. 福斯特 (Forster 1879—1970) 的反叛 (英国中产阶级各种意识形态) 思想，历来是研究者的重要关注点。但是，相对于研究者多将目光投向他生前发表的 5 部作品以及当中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而言，其故后发表的以男同性恋为题材的《莫瑞斯》(Maurice) 则受到的关注较少。该小说从性倾向角度切入而对中产阶级有关性 (别) 规范进行的反思，不但丰富了福斯特的创作主题，更将同性恋这一边缘群体置于小说文本的中心，直接把矛头对准人类最根本的异性恋机制。可见，要理解福斯特反叛思想的本质，这部小说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而多少被忽视的切入点。本文正立足于此，试图通过对《莫瑞斯》的文本细读，从三个层面来展开相应的论题：福斯特如何处理同性恋欲望？在男男同性情欲的语境中，他对性的想象是否可以完全打破传统异性恋关系的结构模式？如果没有，那么其原因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试图展现出福斯特对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并非表现为单一的反叛，同时也隐含着内化意识形态规训的暧昧迹象。

一、欲望与男性性别身份

《莫瑞斯》以 20 世纪初期为时间背景，叙述了出生中产阶级的男主人公莫瑞斯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与社会困境。在此，“同性恋欲望”既是他即

有性别身份遭受威胁的象征，同时也成为他重塑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的突破口。

根据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普斯情结的理论，人必须经过认同与欲望的分道扬镳，亦即“认同”同性别之父，“欲望”异性别之母，才可进入“正常”的异性恋结构。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由此提出，在父权社会里，男女概念和异性恋机制是一体成形的，背后蕴含对同性恋的禁忌，以致同性恋变得无法启齿、不合法，其惯用的手段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利用各种方式实施性别的社会化教育，时时对性别、性取向进行监管^{[1](64-65)}。莫瑞斯早在预备学校时，就开始受到这种性别社会化教育：杜希教授不但进行性启蒙讲解，并告知他个体在异性恋社会中的“正常”婚姻定位，而邻居巴里大夫作为他家至高无上的权威者，常与其母一道，督促他应该走与其死去的父亲相同的人生道路，做体面的中产阶级人士。对文化里这种僵固的男女性别角色及强迫异性恋机制，莫瑞斯同时赞成又否认，认同又挑衅既有的性与性别规训，这种正负双重的自我意识表现如下：一方面他积极将肉体强壮、勇敢、拼搏精神看做成为一个男人的标志，如他“欺负那些看上去闷闷不乐或孱弱的学生”^{[2](16)}，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同时在家庭中试着扮演男性主人的角色，把马车换成小轿车，拜访父亲的老搭档，“决定从剑桥毕业后，就作为一名不持有股东资格的社员进入希尔与霍尔证券交易公司。”^{[2](54)}但另一方面，他又时时感到自己平庸、怯懦，这种自厌感混杂着对此期内心同性恋欲望萌动的难以面对，显现异性恋主义与传统性别意

收稿日期：2007-01-08

作者简介：陈静梅(1979-)，女，贵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 2005 级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

识所造成的自我异化和扭曲。直到他进入剑桥大学遇到同学德拉姆,才获得正视自我的机会。而德拉姆向他表白爱慕的场景,也成为他正式认同自己男性性别身份的契机。当莫瑞斯听到德拉姆对他说出“我爱你”时,他最初的反应是“感到愤慨与毛骨悚然”,无法抑制地叫德拉姆“哦,别胡说”,因为“这是惟一绝对被禁忌的话题。它是列在大学要览里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这确实是一种可鄙的非分之想。”^{[2](58)}“犯罪”“非分之想”借由莫瑞斯之口说出,犹如一种针对其隐含观众的表演,此观众既是正严密监视着他的异性恋社会(违背性别身份意味着将遭受羞辱),同时亦是针对内心正欲望着同性的另一个自我。赛卓维克(Eve Sedgwick)指出,对于同性恋等酷儿而言,对羞辱的认识“是构成身份的第一项,也会是永远的一项事实。”^{[3](14)}换言之,德拉姆的表白既使他认识到自己将面临的羞辱境遇,但同时也是激起他正视自我的最佳时刻。所以,在经过内心挣扎过后,他不但主动向德拉姆示爱,还将此行为看做是自己真正“变成了男子汉”的标志。^{[2](62)}

在此,莫瑞斯将正视自己的性欲望当做对男性性别身份的一种考验,回应的正是父权社会要求男性这一性别应该表达的东西——勇敢,这无疑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试图拿来为自己的“异常”正名。那么,这种“正名”方式何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可以使莫瑞斯无惧主流社会的惩罚呢?叙述者借他对母亲及妹妹的态度变化揭示了答案。在他还是小男孩时,他“喜爱自己这个家,并将母亲看做保佑它的守护神”“他也喜欢妹妹们”,而当他进入剑桥遇见德拉姆后,他却认为与母亲、妹妹相处会令自己退化:“他的思路没有了条理,感情变得脆弱”,更把自己对德拉姆求爱的恐惧反应理解为是受限于“郊区狭隘灵魂的影响”^{[2](11)}。所以,在他正视自我后,叙述者将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进行了区别:“倘若能够对人加以评价的话,过去他不值得让任何人爱慕。他曾经是个墨守成规、心胸狭窄、背信弃义的人。他连自己都欺骗,又怎么能忠于旁人呢?现在他具有能够赠送人们的最有价值的礼品了。”^{[2](62)}作者还以出现在他身上一连串的性格变化来加强这一点:他开始不再害怕黑暗、拒绝去教堂(这是母亲惟一不得不去的地方),敢公开顶撞母亲,“在家中确立了自己的权力,母亲开始用对丈夫的那种口吻说话”^{[2](105)}。很明显,“母亲”此意符在文本中代表了三重意义:生理/家庭的、宗教/教会的和中产阶级的。可见,莫瑞斯对自己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反传统,以及摆脱母亲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平庸及腐朽的基础上。因此,正视自己的内心欲望于是

成为一则追求中产阶级男性新生的喻说,而他的“异常”正是为了有别于母亲等“正常人”的“平凡庸俗”。在此,母亲/女人在文本中沦为男性同性情欲偷渡正名的合法中介(联系文本中对女性的刻画多表现其无知、狭隘等性格)。

可见,福斯特通过莫瑞斯对自己“异常”性欲望的认同来作为建立男性性别身份的基础,指向的正是对中产阶级男性的重塑:这一“新”的中产阶级男性不但具备勇敢的品质,更将摆脱旧有的平庸与腐朽。而他对外女性的弃绝与其说是生理的必然选择(叙述者曾借医生之口指出莫瑞斯是天生的同性恋),还不如说是为渲染男性气质而运用的一种“反常”技巧。基于此,福斯特对性别的再现可见并未甩脱传统的性别头盔,因为文本在松动“同性恋与异性恋”对立架构的同时,对男性气质的渲染已暗中再次巩固了传统性别架构中的支配/从属亦或男与女的对立。

二、多元情欲关系与乌托邦未来

如同福斯特以同性恋欲望作为重塑中产阶级男性的突破口所显现的矛盾那样,他对小说中男男情欲关系的处理也体现出矛盾性:即一方面他力图避免重蹈传统异性恋关系中主动/从属的性爱脚本,营造出多元的情欲想象图景,但另一方面,他又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赋予男同性恋情以合理性与未来。

首先,福斯特通过让情欲双方建立互为主体的关系,从而突破了异性恋关系中主动/从属的性爱结构。在文本中,莫瑞斯的同性恋情经历了从纯精神之爱到肉欲之爱的发展过程。纯精神之爱指的是他与同学德拉姆的关系,肉欲之爱则指他后来与德拉姆家的猎场守门员阿列克的恋情。在纯精神之爱阶段,虽然德拉姆主动示爱使莫瑞斯认识到自己内在潜伏的同性欲望,但莫瑞斯最初“愤慨与毛骨悚然”的反应,却使德拉姆因害怕而退缩,反倒是莫瑞斯在认清自我后主动出击,向德拉姆表白心意才使感情得以发生。德拉姆告诉莫瑞斯,“倘若你高抬贵手,容我听其自然,我就会半睡半醒地了此一生”,“也许咱们俩是互相被唤醒了。”^{[2](94)}这种互为主体客体的关系也体现在他与阿列克的关系中。在他留在德拉姆家休养的时候,他因阿列克的引诱而与之发生了肉体关系,迫于对社会压力的畏惧以及阶级意识影响,他试图通过逃避以及求助医学来使自己回归“正常”,但阿列克不但主动写信来传达爱意,更因莫瑞斯的逃避态度而发出威胁的挑衅,这促使莫瑞斯不得不再次正视自己内心对肉欲的渴

望，最终与阿列克结合。表面上看，莫瑞斯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他是“被诱奸者”，所以他的主体性已经遭到破坏。但尚·莱兰切(Jean Laplanche)指出，对于男性主体而言，应该将引诱理解为既是破坏主体稳定的男性气质身份的一个幻想过程，同时又是幻想被重获以及维持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通过建立一种联系（引诱之前的身份与引诱之后的身份之间）来改变主体已获得的意义，此过程不但创造一种持续的受到控制的身份危机，与此同时，也生发出在危机中自我治愈以及重建主体性的力量^[4]。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亦可将阿列克对莫瑞斯的引诱理解为是莫瑞斯重建主体性的象征。因为正是由于受到引诱的触发，莫瑞斯才获得直面自己对肉欲渴求的契机，这一契机不但看清了自己将要面临的社会处境，而且也赋予他反叛自己阶级的力量与勇气。文本进而刻画了他一系列主动性的表现：在决定要与阿列克在一起后，他提出与阿列克“谈谈今后的打算”，并劝阻阿列克放弃了远赴阿根廷谋生的计划，留在自己的身边：“他把阿列克内部的男子汉亮出来了，现在轮到阿列克来亮出他内部的英雄。他知道什么在召唤自己，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回答。他们必须打破阶级的畛域来生活，没有亲属，囊空如洗，他们必须劳动，至死相依为命。”^{[2](264)}可见，无论是哪种形态的爱情，情欲双方的主客关系都不是绝对对立、一成不变的，而是试图表现为流动的、交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其次，作者还通过莫瑞斯遭受纯精神之爱与肉欲之爱的矛盾，营造出男同性情欲的多样性。德拉姆虽然使莫瑞斯认识到自己的同性欲望，但他将莫瑞斯带入的是纯精神世界，文本特别通过他关于绘画的议论来体现这一点，在他看来，“风景是惟一安全的题材。……倘若你把人体画下来，当即会引起厌恶或挑逗起欲望。”^{[2](96)}德拉姆对肉欲的厌恶与他钻研古典文学的目的是一样的，即希望找到可以让他的灵魂在基督教中获得立足点的解释，很显然，这暗示了出身乡绅门第的他其实并不是真正地认同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也为他后来突然因一次感冒与护士的接触而转为异性恋做了铺垫。当然作者是借此来加深莫瑞斯认同的困难性，但这同时也为男同性恋情开放出更多的形态。而莫瑞斯最终与阿列克在肉欲上的认同，既代表着精神与肉欲冲突的解决，又意味着对性爱合一的理想型的男同性恋情的追求，呈现出较多元的男同性情欲面貌。

但是，小说所再现的对性爱合一的理想型男同性恋情的追求，其合理性是建立在反抗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下。文本特意用克莱夫与一位爵士的女儿安妮

的婚后生活来进行对比说明：“性问题不仅是两个人不能涉及的话题，就是在二人结合时也是一言不发”，“他从未看到过她的裸体，她也没瞧见过他的。”^{[2](179)}另外，作者特意在小说结尾赋予这种性爱合一的情欲关系以回归“绿林”为归宿，以乌托邦的形式更加明确地表示：莫瑞斯与阿列克的同性情欲代表的是从回归自然/远离文明中获得和恢复健旺生命力的期望。

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福斯特所塑造的男同性恋情欲其实超越了表面的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对立，毋宁说更像一则反叛现代文明的喻说。尽管他打破传统异性恋关系中主动/从属的性爱脚本来处理男男爱欲，开放出关于男男爱欲的多样图貌，但是，其立足点却依赖于这则同性恋故事对反传统、跨阶级与反叛现代文明意图的承载。那么，一旦除却这些，男同性恋情本身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变得一如想象中的绿林般那样遥远与虚无缥缈，陷入避而不答的尴尬之地，从而削弱了其对抗异性恋霸权机制的力度。

三、矛盾多义的根源

福斯特在《莫瑞斯》中对性欲望、性别身份以及性关系等方面的想象所体现的矛盾性，与他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他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密切联系的。

《莫瑞斯》的初稿在1913年动笔，1914年即完成了写作，这一时期也正是英国社会对性（别）充满焦虑的时代，亦称之为“性（别）无政府（sexual anarchy）”时代^{[5](109)}。根据萧娃特（Elaine Showalter）的说法，从19世纪末开始，虽然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带来外表的鼎盛，但内部却充满强烈的文化焦虑，害怕文明倒退、没落，特别是有关男同性恋与童妓等性绯闻、工人失业等社会事件，直接引发中产阶级对体制将顷的焦虑。在中产阶级看来，男同性恋以及当时时髦的唯美风潮，均是对维多利亚时期强调的绅士的威猛阳刚的背离，是一种女性化的表现，因此统统斥之“颓废”。而王尔德（Oscar Wilde）1895年受审入狱一案，不但使“同性恋”一词正式进入语汇，也使恐惧同性恋幻想高张，加深对之的禁制打压^{[5](171)}。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当时英国许多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作家都害怕暴露自己的性取向而遭受社会抛弃，受到司法制裁，因而生前均选择秘密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比如毛姆、豪士曼（A.E.Housman 1859—1936）等。福斯特本人也不例外，终其一生除少数好友外，其余世人根本不知晓他的同性恋倾向，而他对社会制

裁的恐惧也鲜明地体现在他对《莫瑞斯》一书的出版处理上。根据菲·尼·费尔班克在为《莫瑞斯》一书所写导言中的介绍,福斯特迫于当时社会的压力,在写完《莫瑞斯》后并未立即出版。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代,在英国社会对性问题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以及其母与近亲纷纷去世之后,福斯特由于仍然担心会引起公众的“喧闹骚动”,还是坚决拒绝了好友的出版建议,并最终精心安排它在自己逝世后即1971年才发表^{[2](5)}。这一“有意”为之的举措,说明了社会压力对福斯特影响之深,但对现实的妥协态度并不意味着放弃以同性恋为创作题材。在《结尾的札记》中,福斯特就很坚定地表明自己创作《莫瑞斯》的意图:“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那么,在想象中他敢于对自己做出保证:他相信同性恋是美好的。他需要义无反顾地肯定,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2](276)}这种强烈地为同性恋正名的意图,毋庸置疑是对当时社会对待同性恋的一种回应。而小说中他对莫瑞斯男性性别身份的着重强调,很显然是要摆脱时人所认定的男同性恋者“女性化”的刻板印象。但是,这种正名由于只是以改变时人对待同性恋的印象为出发点,因此减弱了对意识形态机制的批判性思考,反而陷入对男性气质的过分诉求,再度巩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

更进一步说,这种对正名的诉求,其实也是福斯特本人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使然。即他一方面要抗争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这种抗争却是立足于中产阶级群体利益的阶级、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身份重构。如果我们把目光扩大到他整个创作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的创作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焦点,贯穿对男男“连接”的强调。比如《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将男男连接模式放入英国与意大利跨文化的背景内,刻画了年轻俊美的意大利青年吉诺引导来自英国的律师菲力普克服中产阶级的矫揉造作与偏狭;《最漫长的旅程》描写的是瑞克与史蒂芬这对同母异父的兄弟超阶级的连接,史蒂芬扮演的是焕发酒神式活力的自然之子,来将爱略特从中产阶级的陈规陋习中解救出来;而《印度之行》则进一步将男性连接的叙事发展到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菲尔丁,与印度男青年阿齐兹之间的跨种族关系上。而在《莫瑞斯》中,莫瑞斯在故事结尾与阿列克能获得幸福,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阿列克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他获得反省自己所属阶级的机会以及跨越阶级界限的勇气。因此,可以说在福斯特笔下的男男连接中,这些中产阶级男性主体都呈现出试图“逾越”阶级、性别、民族和种族界限的努力。这种努力与他对英国社会在城市化和殖民主义带来的异质文化境遇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或遭遇到的冲突思考是相联系的^{[6](266)}。类似的作家还有D.H.劳伦斯,他们在刻画出中产阶级所散发出如腐尸般恶臭的精神气质的同时,其实也在积极探索着解救中产阶级的方法。事实上,中产阶级男性主体通过连接而进行“逾越”举动,本身即已暗示着一种新生的出路,因为逾越的动力正是来自与中产阶级男性(自私、偏狭等特点)对立的另一方所体现出的男性品格(如活力、自由、勇敢等),而中产阶级男性的逾越举动既代表着他们对对方品格的认同,也意味着他们必然获得也必须具备这类“新”的品质。

这种对中产阶级既批判又积极寻求出路的态度,决定了福斯特对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能表现为彻底决绝的反叛。换言之,虽然他试图在小说中为同性恋情正名并赋予其美好的未来,但这种正名由于与重塑中产阶级男性主体联系在一起,势必又将在隐性的层面落入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此特指有关男性性别的规训,因而留下重蹈父权价值形态的斧痕。而就在这一显一隐的张力之间,小说矛盾多义的阅读空间也因此得以开放。

四、结语

综上所述,福斯特对男同性恋的再现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他笔下的罗曼史非但勾勒出男同性恋爱的挫败与追求,凸现同性恋者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遭受的孤绝、扭曲,又借着复杂的男同性恋关系质疑了异性恋体制下的性别与情欲概念,但同时也把异性恋结构里关于欲望、性别与权力关系的问题以变形的形式复制出来。而福斯特的重要性恰巧在于他呈现出男同性恋世界与异性恋结构的这种复杂勾连关系。因此,他的小说可谓是对文化及文学领域里关于情欲想象的一种丰富,并使我们看到爱欲、性别与书写之间错综微妙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以男同性恋的性爱合一来反叛现代文明的企图带有消极的思想,但他实则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应该如何来协调人性与文明的发展?这是福斯特的《莫瑞斯》留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也是它的文学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 Foster E M. Maurice[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1

(下转第357页)